



歷史與文化叢書

歷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

凱斯·詹金斯 著

Keith Jenkins

賈士衡 譯

盧建榮 導讀

歷史是一意以研究過去為目的，研究過去為目的，由一群思想現代化的工作者所創造，他們在工作，而他們的作品一旦出版，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會被一連串濫用在邏輯上是無足無輕，是無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的權力基礎相對應，應去相對應，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

《歷史的再思考》帶我們從像塊作重新的角度，重新思考歷史的定義，思考歷史與過去、與真實、與偏見、證據，及權力競逐之間的互動關聯。作者以簡潔犀利的辯證，直指傳統史學的迷思，並協助讀者們以歷史性、懷疑性和批判性的自覺思維，在後現代世界重新認識歷史，製作歷史。

「這是一部簡潔論證的典範之作，提出了後現代世界有關歷史學性質的基本問題。」

亞倫·懷特

ISBN 957-708-453-2 (601.4)



00150



9 789577 084538

RH5001

售價：150元

cité 城邦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歷史的再思考 / 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

著；賈士衡譯。--初版。--臺北市：麥田，民85

面；公分。--（歷史與文化叢書；1）

譯自：Re-thinking history

含索引

ISBN 957-708-453-2(平裝)

1. 史學－哲學，原理

601.4

85011851

數字知識
PDG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1

歷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

著/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譯/賈士衡

麥田出版

RE-THINKING HISTORY

Copyright © 1991 by Keith Jenkin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6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1

歷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HISTORY

作者 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譯者 賈士蘅

主編 盧建榮

責任編輯 吳莉君

發行人 涂玉雲

出版 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2351-7776 傳真：2351-9179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2396-5698 傳真：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 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 citekl@cite.com.tw.

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1996 年 12 月 1 日

初版九刷 2003 年 9 月 1 日

ISBN：957-708-453-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售價：150 元

Printed in Taiwan

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

英國史學家。

曾任教於西蘇薩克斯高等教育暨史學方法研究院，現任齊切斯特研究所歷史高級講師，及研究所教育資格檢定(PGCE)史學方法導師。致力於後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的探討及歷史教育的發展。

著有《論「何謂歷史」：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等書。

賈士衡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肄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系博士班肄業。

曾服務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任美國丹佛美術博物館研究員，並從事翻譯工作。譯有《英國史》（五南）、《英國人類社會學》（聯經）、《英國社會史》（國立編譯館）等書。

目錄

導 讀 後現代歷史學指南

——讓我們重畫國內大學歷史教學的版圖 /7

致 謝 /37

引 言 /43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53

在理論上 /55

在實踐上 /78

歷史的定義 /87

第二章 論一些問題和答案 /89

論真實 /92

論事實和解釋 /99

論偏見 /107

論神入 /111

論資料與證據 /122

論對語：因果關係等等 /127

歷史學：一門科學或一門藝術 /132

結論 /134

第三章 在後現代世界做歷史 /139

索引

導 讀

後現代歷史學指南

讓我們重畫國內大學歷史教學的版圖

盧建榮

一、前言

英國西蘇薩克斯(West Sussex)高等教育暨史學方法研究院的教授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 現任齊切斯特[Chichester] 研究所歷史高級講師)不惜為我們放下學者身段、以深入淺出的筆觸描繪一幅後現代主義式的歷史學之圖。後現代主義並不是已發展成熟、且穩定不變的學說,而是代表異於、甚或反對二十世紀既有學術成規的一個傾向,其中衆說紛紜、難有定論。簡言之,它不是一個一致性的運動,而是面對混沌未來的一時權宜稱號。即令如此,後現代主義對各種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衝擊既深且鉅,歷史學也不例外。

歷史學是一門早在現代學術分科之前即已存在的古老

學門，中、西歷史學在這點上是沒有差別的。中西歷史學差別的是，西方自十九世紀初葉起，不但大學開始設立歷史學講座一職，民間部門也發展出專業歷史這門行業，而同業中有園地公開（按：就理論而言）的專屬雜誌；接著，十九世紀最後一個二十五年內，由德、法、英陸續完成國家資助全國性歷史刊物的制度（White, 1973：136）。這是普世性的現代歷史學的源頭。其中包含以下三個要素：學院培育史學人才、專業要求同行，以及歷史寫作不受國家干預等。中國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向現代歷史學的體制邁出一大步，但傳統史學的餘威猶存。此處所謂中國傳統史學的餘威，指的是其一、創立於七世紀歷史撰述權操縱在國家之手的「國史館制」猶自發揮功能，以及其二、史料考訂的方法仍不脫清初前現代的窠臼。民初中國史學的植基工作基本上是與現代歷史學的軌跡暗合，但難以「破舊立新」一語來概括其發展。遠者無庸多論，還是回到本文重點，即以戰後台灣史學界而論，源於中古舊制的國史館依然屹立不搖。而國史館制侵蝕史學根基的議題尚未見諸改革議程表，我不希望這個當年祖宗所犯的錯繼續在二十一世紀殘害我們的子孫。至於以史料考訂代表史學的學風已在七〇年代以後逐漸沒落，如今已不成其問題。

回頭再看二十世紀世界史壇的發展，改革的呼聲迄未中斷。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先是反對絕對客觀主義，繼則反對唯統治階層馬首是瞻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改而提倡社

會史，末則呼應後現代主義使現代歷史學所標榜的相對客觀性降至最低。回顧以上史學三變，台灣都有所回應，茲以西方史學譯著和評介的角度來說明這點。譬如，1968年英國史家卡耳(E. H. Carr)《歷史論集》(按：原著出版於1963)中譯本的出版、七〇至八〇年代《食貨》的復刊和《史學評論》的出現，以及1996年美國史家林·亨特(Lynn Hunt)等三人著《歷史的真相》(按：原著出版於1995)中譯本的問世等等。1991年英國史家詹京斯出版《歷史再思考》一書，是針對卡耳《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一書而發，認為所論已不合新時代的需求，他是藉著卡耳所提問的老問題重新作答。詹氏於1995年索性衝著卡耳的書名而來，出版了《論「何謂歷史？」》(*On 'What is History?'*)一書。詹氏兩書可以說是姊妹作，所論雖同，但前者類精華本或縮節本，後者內容翔實，部幅稍厚。因此，我們看到歐洲六〇年代轉換成九〇年代的變化，這個變化代表的是後結構主義的躍動。至於1995年問世的《歷史的真相》一書，則是針對後結構主義躍動而發的美國版代表作。英美史家於世紀末先後重新反省歷史學的性質，這對台灣史學界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二、詹氏之見的學術背景

在未解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介紹詹京斯後現代主義史學

的看法。西方史學在揚棄十九世紀絕對客觀的前提之下，不僅各國史學保有其特色，而且即一國之內或派系林立、或個人風格強烈不一而足 (Laqueur & Mosse, 1967：散落各處)。但在這「花團錦簇」以及「爭奇鬥妍」的外觀之下，有一共同旗幟，即後現代主義者給予的標籤：「現代性」，多少可以涵蓋。1946 年柯靈烏出版《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衝決了科學主義史學的藩籬以來，迄今甫滿五十年。這五十年來史學演進的結果，變成主流史學流派的，大抵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法國年鑑史學，以及英國新左派史學等在主領風騷。這些史學流派對照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史學專業化制度的建立，便構成了史學革新的主要內容。

每一代的學術業績發展至登峯造極之境，總會引來一些求新企變之士的不滿。於是，有人打著「後現代」旗號另闢蹊徑。大致而言，1984 年英語世界出版法國文化批評大師之一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的《後現代情境》(*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一書，是一個關鍵事件兼年分。誠如本書作者詹京斯所言，在後工業社會中，電腦資訊業的發達改變了人們對知識形式的認識，以及對資訊讀取的習慣。李歐塔一書對人文暨社會科學衝擊之大，迄今仍在作用中，持平的說法應是：難以估計。就縮小範圍只談史學吧。現代史學不分流派，都主張線形的進步觀，都以為社會是在合理性基礎下運作 (Laqueur & Mosse, 1967：34-47, 185-207, 253-265)。這樣的認識使得以多元觀點、多

層次探索人類社會的複雜原理成為不大可能。後現代主義者或其代言人都對上述現代史學的平面且一元的認識觀產生不滿。因此，就在提倡社會史史學陣營中一支求變殷切的隊伍以異軍突起之姿，向原來已有共識的知識傳統挑戰。這支史學新軍刻意標榜：「歷史雖然處理過去，但歷史無法重建過去」、「過去是論述的組構」，以及「歷史是過去的再現」等等激烈的主張。面對這些新說，自有絕大多數史家以不變應萬變不足為奇，但也有一些史家可以部分欣賞，如專治荷蘭史的美國名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只接受歷史是過去的再現這樣的新觀念(Callinicos, 1995: 4)，也有一些史家幾乎全盤接受，如本書作者詹京斯即是。

環繞在上述針對知識性質進行反思的問題上，一些學術理論大師都競相提出他們的卓見。譬如，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受歷史學者父親的影響，認為，歷史學的知識是不可靠的。他以其心理學專業心得，於探討兒童學習能力的奧秘之餘，更指出人的記憶是有問題的(Bringuiet, 1994: 11, 180-182)。隨著皮亞傑名氣的浮升，他上述的看法對歷史學的危害難免與日俱增。再如傅柯(Foucault)以為，歷史學是一門權力關係結果的學問，在他所倡導的知識／權力的學術議題上，使得後人在思索歷史知識性質時有了嶄新的著力點。德士康堡(Descombes)於其《法國現代哲學》(*Modern French Philosophy*)一書專章論及傅柯時，就以「歷史是西方的迷思」作為開場白，

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Descombes, 1980 : 110)。又如羅遜 (Richard Rorty) 於其《偶然・諷刺和團結》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書中說：「真理永遠是被創造的，而非被發現的。」 (頁 3) 類似以上三位學者的意見所在多有，不能遍舉。總之，一些前衛學者在重探知識性質的工作上，引領後繼學者對歷史學有了新的看法。

最有趣的是，與歷史學誼屬相鄰學科的文學和哲學，比歷史學家還早思索「過去」的性質。哲學學者之於古代哲學作品、文學批評家之於文學作品都讓他們警覺到，日與他們為伍的研究對象都是過去的產物，但卻不能與過去劃上等號。易言之，古今文、哲作家在寫出作品後，後來的哲學學者和文學批評家都無法掌握當初創作者的精神狀態和意識活動，只能就作品——創作活動的遺跡——來從事研究。研究者藉著作品了解到過去曾有的創作活動，但僅止於了解到這點而已，無法重建曾有的那次創作活動。因此，文、哲學者發展出一對有用的分析工具語言，即文本和論述。研究者面對作品時，其實他是在面對過去，而過去又不可掌握，於是改而提倡說，研究者是在處理文本，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則是在處理論述的工作。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學者接受了上述文學批評家和哲學學者的理念：研究工作是一種面對過去的工作，然因過去是難以掌握的，故而也開始借用文本和論述的工具術語從事史學研究。

三、詹氏的寫作策略

以上約略敘述了詹京斯寫作本書的學術背景，以下便直接進入詹著世界。詹著設定的讀者羣不限於專業人士或歷史系科班學生，出版社希望該書能讓一般人都讀懂，因此第一力求篇幅不多，以免嚇壞一般讀者的閱讀興趣，第二做到例解淺顯，以免讀之反增閱讀負擔。該書的確分量（頁數）甚輕，但內容卻豐富可觀，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讓萬一讀畢、意猶未盡的讀者可憑藉相關附註的指引書目，自行掌握線索並訂定深入閱讀的計畫。作者在書中一條註釋中，向讀者剴切說明，無意寫出一部卷帙浩繁的理由。我相信，作者要旁徵博引，其事不難。其次，作者雖寫給英國人（或擴大之為英語世界人士）看，但所舉之例盡可能用二十世紀讀書人共歷的經驗或熟知的學術傳統為例。例如，舉一、二次大戰原因為例，來說明「事實與解釋」和「史料」的問題，這是看準本世紀中人都對兩次大戰耳熟能詳的緣故。再如，作者喜用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和湯普森（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產生》兩書來作例解，確實成效卓著。以上兩書雖係英國的名著，但早已跨越國界而深入各國讀書人的腦海。英國獨有例子很少作成例解，即有，也是英國史上重大事件，例如克倫威爾（Cromwell）的清教徒革命和 1832 年改革法案等，都見諸

台灣中學歷史課本。(萬一中文讀者離開中學日子夠久，早已忘了 1832 年改法案為何物，也不礙事。麥田出版社的編輯部已幫讀者做出簡要說明。)以上寫作策略的化繁為簡和例證通俗可親，無疑讓讀者可以既經濟且輕鬆的學到最新知識。這真是讀者的福音。

四、詹氏的史學思想

詹京斯認為歷史知識的製造與底下四個因素息息相關：其一、歷史家共同的寫作特性和癖性，其二、學院訓練規格，其三、學術社羣壓力，以及其四、出版社審查權和主編權威等。我不想逐項說明，相反地，我從台灣過去幾年學習西方史學所形成的支配性論述談起。

台灣史學理論的來源，大體上不出柯靈烏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以及卡耳所言：「歷史是史家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這個範圍。卡耳《歷史論集》（按：台北，幼獅，1969）和柯靈烏《史意》（按：台北，正文，1968，即《歷史的理念》）兩書無獨有偶地都在六〇年代末被輔大一對師徒——王任光先生和黃超民先生——譯成中文，而風行一時。這兩句話幾乎構成台灣史界以迄九〇年代的支配性歷史知識的迷思。

這樣的迷思正是詹京斯所要批判的。柯靈烏要求歷史家以己之心靈忖度古人之心靈，如此才能了解古人何以會